

西周时期的殷墟与周边：文化的传承与革新

——附论有关殷遗民的若干问题

牛世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100710）

提要：在殷商故都及周边地区，西周文化明显具有商式、关中典型周式和豫北冀南周式三类风格，文化特征在地域上有一定差别。殷墟范围的西周文化包含西周早、晚两个时期，遗址地点很少，文化传统表现为浓厚的西周文化风格；殷墟周边的西周文化涵盖整个西周时期，遗址地点较多，文化传统表现为浓厚的殷商文化风格。殷墟及其周边的西周文化对殷商文化和典型西周文化的传承和革新有一定差别。文献记载周人所迁的殷遗民，其主体甚至大多数人应该是原来生活在殷商故都的以家族为单元的族群。

关键词：殷墟 西周文化 传承 革新 殷遗民

河南安阳市西北部的殷墟是商代晚期的王朝都城所在，殷墟卜辞中称之“大邑商”，传世文献中称为“商邑”。据文献记载，周人灭商和周公东征后，大都商邑彻底沦为废墟。与之前辉煌了 270 多年的晚商王都相比，在西周时期，殷商故都及其周边的西周文化面貌呈何种形态，其所反映的邑聚和人群构成有着怎样的特点，长期以来由于有关发现相对较少，一直不是很清楚。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有关资料的增多，包括殷墟及其周边乃至太行山东麓西周文化的情况，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1]。本文通过对殷墟以及周边地点的西周遗存进行分析，就上述问题作进一步探讨，并附论殷遗民及有关问题。

一．殷墟及周边地区的西周考古发现

长期以来，对殷墟及周边的古代文化的考古工作首先是围绕研究殷墟文化展开的，如在探索殷墟的范围和在重要地点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西周遗存。近 10 年来，在配合安阳市外围的公路交通和水利工程建设中，也发现一些西周遗址。

1934 年 10 月-1935 年 1 月，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安阳西北冈的殷商王陵，其中打破王陵的遗迹有西周灰坑和墓葬，并在盗坑中清理出西周陶器^[2]。1977 年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发掘西北冈王陵区一座墓葬（AHBM1）时，在盗掘坑内出土有西周陶片^[3]。

1987 年春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在殷商宫殿区今小屯村东北地进行钻探发掘，在距洹水南岸不远的地段发现了两座西周小墓，其中 M1 打破了殷商宫殿区甲组基址附近的小路^[4]。

198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为配合安阳市抗震大楼建筑工程，在安阳市刘家庄村北进行了钻探和发掘，其中清理西周墓 26 座^[5]。1996 年春，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在刘家庄北地配合基建进行发掘，其中清理西周墓葬 1 座^[6]。

2003-2004 年，在配合安阳钢铁集团基建考古中，在孝民屯发掘区南区清理一批西周墓葬^[7]。

2004 年 9-11 月，为配合安阳至林州的高速公路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安阳市西高平遗址作了发掘，发现先商时期、商代晚期、西周、东周文化遗存，尤以西周文化遗存最为丰富。发掘面积 2300 平方米^[8]，这是已知洹河流域西周遗存最丰富的一处。

2005 年 7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安阳黄张遗址作了调查、钻探和发掘，发现了西周晚期遗存^[9]。

此外，在侯家庄南地曾发掘有西周墓葬和车马坑^[10]。

在殷墟考古不断取得重要成果的同时，学界开始在殷墟所在的洹河流域有计划地开展了多次区域考古调查，也发现了一批包含有西周遗存的遗址，并对部分遗址作了发掘。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洹河安阳一带做了考古调查^[11]。

1961 年夏，安阳市文管会在安阳市及附近地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文物普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派人进行合作调查^[12]，这次普查为在洹河流域进行后续考古调查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1962 年和 1963 年秋，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安阳队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安阳洹河流域进行了连续两年的调查^[13]。在调查的 56 个遗址中，包含有西周遗存的遗址 21 处。期间对部分遗址进行了试掘。如 1962 年试掘了安阳市东的大寒南冈，清理了灰坑遗迹^[14]，1965 年又发掘了 3 座墓葬^[15]。

1977 年至 1979 年，安阳市博物馆对安阳市所辖的洹水两岸区段，进行了两次文物调查^[16]。其中对南士旺永安寨、秋口同乐寨、秋口高井台子、柴库、鲍家堂等遗址等作了重点调查。

1997-1998 年，中美洹河流域考古队又做了系统调查，调查范围以殷墟为中心，向东、向西各约 20 千米，向北、向南各约 10 千米左右^[17]。此次对蒋台屯、柴库、三家庄 3 处遗址作重点调查，并对洹北花园庄遗址进行了大规模钻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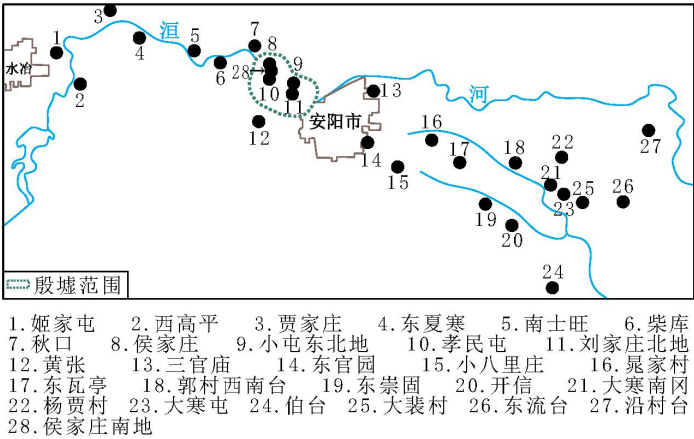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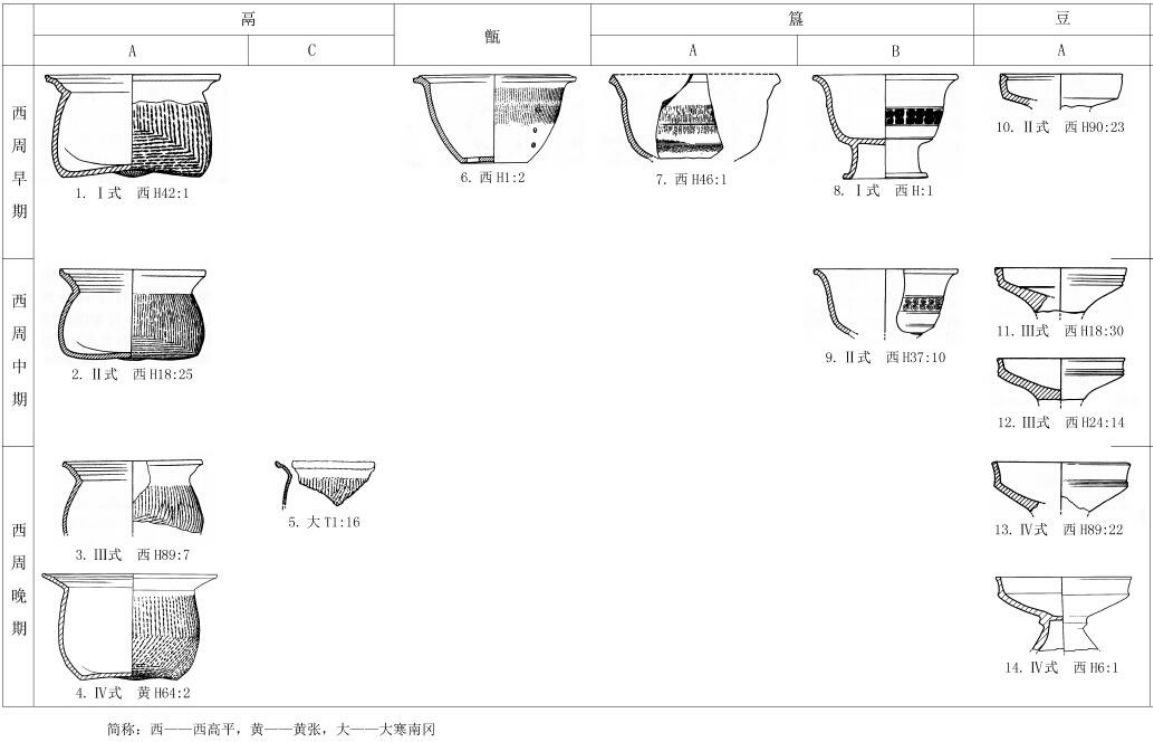
图1 殷墟及周边西周遗址分布示意图

迄今为止，在殷墟及其周边，发现西周遗址 28 处（图 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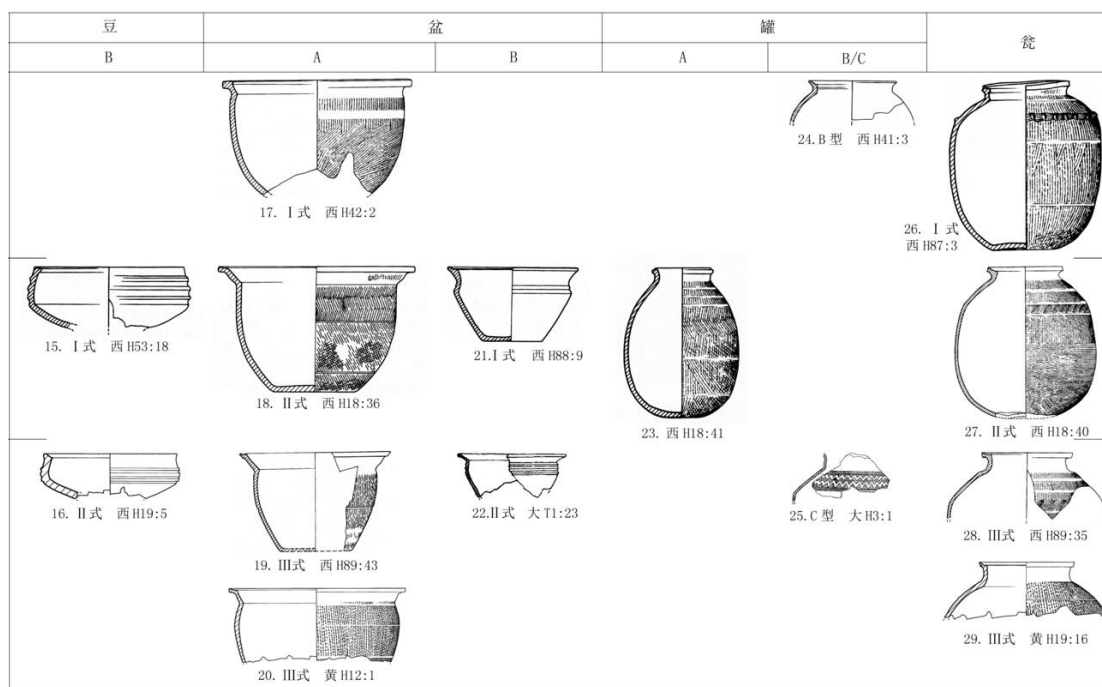
二. 殷墟及周边的西周主要遗存分析

已知 20 多处西周遗址中，大多只经过调查，少数作过正式发掘。正是相关考古发掘资料的不断积累，今天才对殷墟及周边的西周文化信息比以往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些经过考古发掘的遗址有西北冈、大寒南冈、西高平、小屯北地、刘家庄北地、孝民屯、黄张、侯家庄南地等。下面主要对这些发掘的遗址作具体考察，以获知本地西周文化的比较详细的信息。

通过对上列这些遗址作综合分析可知，与其他很多地方的西周文化一样，殷墟及周边西周文化以陶器最具特色。陶器器类有鬲、甗、簋、豆、盆、盂、壶、罐、瓮等。这里的西周陶器大致包含周式、商式等文化风格，其中鬲、簋、豆、罐、瓮等的时代特征强、演化轨迹清晰，成为进一步探讨本地西周文化特征的标志物（图二、图三）。具体的分类如下。



图二 殷墟及周边的西周居址陶器分期图（一）



图二 殷墟及周边的西周居址陶器分期图（二）

鬲 分四型。

A 型 典型商式鬲。扁体。侈口，沿近折，束颈，分裆，裆很低或平裆，无实足跟。分四式：

I 式：斜沿，袋足近直，腹最大径偏下。

II 式：腹最大径比 I 式略高。

III 式：腹最大径在袋腹中部。

IV 式：沿更平，裆近平。

B 型 商式，近似殷墟商文化常见的小型鬲。盘口，束颈，分裆，低裆，实足较矮。分二式：

I 式：扁体，低裆。

II 式：体更扁，裆更低。

C 型 典型的周式联裆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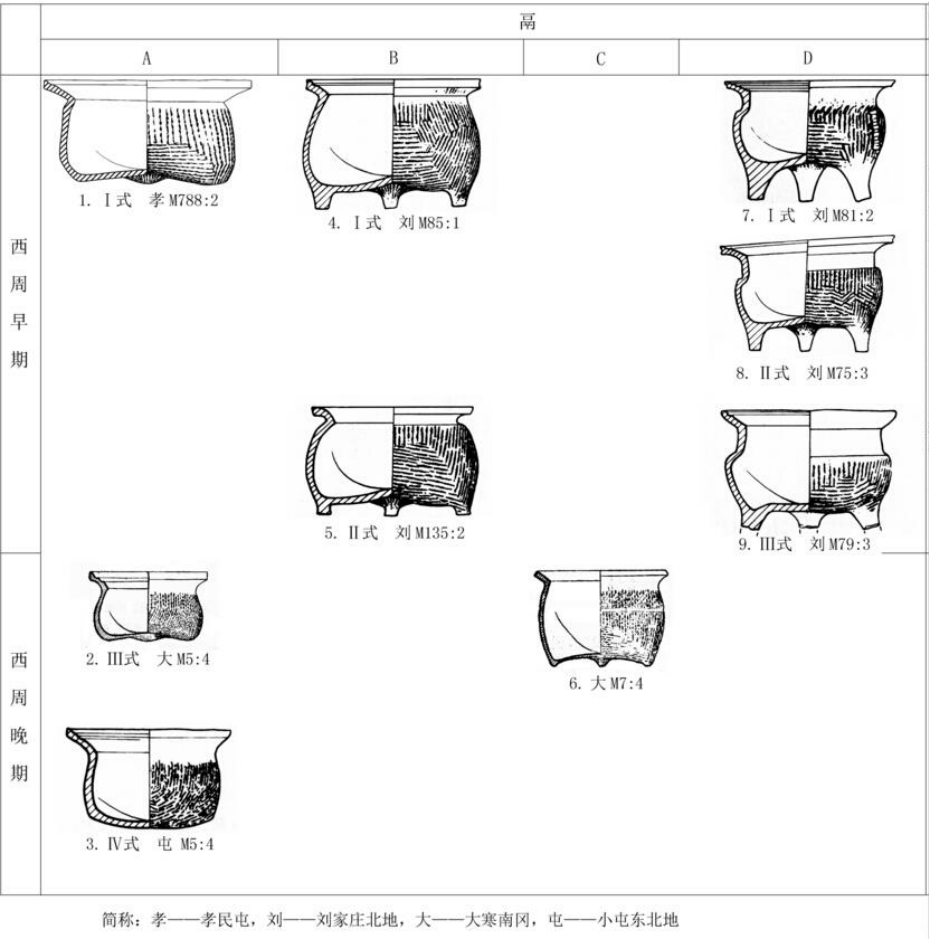
D 型 盘口，束颈，分裆，裆线浅，裆低或近平，柱足。腹部或饰堆纹。非典型周式鬲。

分三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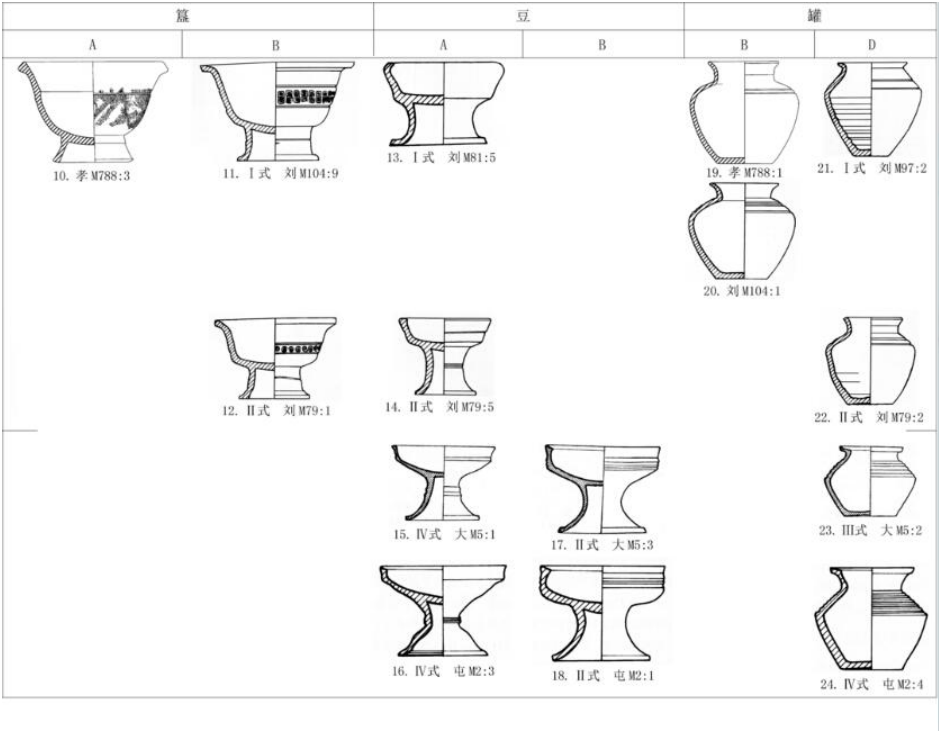
I 式：沿近卷，分裆较明显，裆较高。

II 式：束颈较明显，裆比 I 式低。

III 式：束颈较明显，较宽，平裆。



图三 殷墟及周边的西周居址陶器分期图（一）



图三 殷墟及周边的西周居址陶器分期图（二）

簋 分二型。

A 型 典型商式绳纹簋。

B 型 体磨光，腹饰 S 形纹，西周文化常见。分二式：

I 式：腹较深。

II 式：腹比 I 式浅。

豆体较小。分两型。

A 型 小浅盘，细柄。典型西周文化风格。分四式：

I 式：敛口，盘底近平。

II 式：窄平缘，盘很浅。

III 式：浅盘，盘底中部较低，外壁普遍饰多道弦纹。

IV 式：盘腹较深，柄部饰凸棱。

B 型 盘较大，敛口，腹近折，盘比 A 型深。外普遍饰多道弦纹。分二式：

I 式：盘较深。

II 式：盘较浅。

盆 分二型。

A 型 斜领，深腹，平底。饰绳纹。典型商文化风格。分三式：

I 式：领很短。

II 式：领比 I 式长。

III 式：领较长，腹从中腹向下紧收，底比 I、II 式小。

B 型 折腹，体素面或磨光，折腹处以上多有弦纹。典型西周文化风格。分二式：

I 式：腹较深。

II 式：腹比 I 式浅，腹从折腹处向下急收。

甗 形制近似盆 A 型。

罐 分四型。

A 型 侈口，深腹，圆底。体饰绳纹。典型商文化风格。

B 型 圆肩罐。典型西周文化风格。

C 型 形体较大。侈口，折肩，平底。肩部或饰划纹，肩下饰绳纹。典型西周文化风格。

D 型 形似 C 型，只是体较小，体多素面或磨光，有的肩下饰稀疏的绳纹。典型西周文化风格。分四式：

I 式：短沿近卷，多为圆或尖圆唇，肩部较高。

II 式：沿比 I 式长。

III 式：折沿，方唇，低肩。

IV 式：形近 III 式，但有明显的颈部。

瓮 侈口，折沿，圆肩，深腹，平底。体饰绳纹，肩部或饰附加堆纹。商式风格。分三式：

I 式：斜肩，肩较高，腹最大径在近肩部。

II 式：肩比 I 式略低，腹最大径偏下。

III 式：颈部比前两式明显，肩也变低。

下面，根据陶器特征，对殷墟及周边区域的主要西周遗址逐一介绍和分析。

1. 殷墟范围

在殷墟范围先后发现的西周文化遗存地点有西北冈、小屯北地、孝民屯、刘家庄北地、侯家庄南地等。

(1) 西北冈

位于洹河北今武官村北，这里最重要的发现是 20 世纪 30 年代发掘的包括晚商王陵在内的大型墓葬和大量祭祀坑。据统计，王陵区大墓上共发现晚于大墓的灰堆、灰坑不少于 70 处，其中明确为灰坑的有近 40 处，墓葬 70 多座^[19]；殷商王陵的盗坑中还出土一些陶器，其中一些明确为西周遗存^[20]。

西周遗存中，所见灰坑出土有商式鬲，墓葬随葬品为商式鬲或周式的鬲、簋、豆、罐。殷商王陵的盗坑出土有西周陶器，形态大多可复原，有学者认为这些是周人盗掘商王陵时的遗留^[21]，实际上它们可能大多是墓葬的随葬品^[22]，器类的形态为清一色的周式鬲、簋、豆、罐^[23]。由于后来发生盗墓行为，这些西周墓葬与殷商王陵一起被破坏、器物被回填到盗坑中。从形态可知，这些西周墓葬都是西周早期的。另在 78BM1 盗掘坑内也出土西周陶片，由于简报未作详细介绍，现在还不好判断原本是西周墓葬所出还是在居址出土的。

(2) 小屯北地

这里最明确的西周遗存是小屯村东北地发现的 2 座西周墓葬（M1、M2）。均为小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其中 M1 仅随葬 1 件陶豆，M2 随葬鬲 1、罐 1、豆 2。从陶器形态看，两座墓葬都是西周晚期的。此外，1928-1937 年间，小屯北地曾发掘出土有西周陶器 3 件，所见有鬲 1 件、豆 2 件^[24]，完整或可复原。其中鬲的时代为西周晚期，豆为西周早期，应该都属于墓葬随葬品。

(3) 刘家庄北地

位于殷墟宫殿宗庙区正南、今安钢大道的南面。这是迄今所见殷墟范围内相对丰富的一处。两次共清理墓葬 27 座，均为小型竖穴土坑墓。长一般为 2-2.60 米，宽 0.70-1 米，仅 M119 略大，长 3.20、宽 2.10 米。有腰坑的墓仅有 7 座。除 1 座不明外，其他墓葬都有木棺，无槨。棺多髹红、黄、黑、白色漆。人骨葬式有仰身直肢葬（17 座），俯身直肢葬（2 座），侧身直肢葬（1 座）。另有 2 座为直肢葬。4 座带腰坑的墓中各殉 1 条狗。

除 M105 因被 M104 打破未见随葬品外，余均出土有随葬品。随葬品一般都置于人骨头端的二层台上或棺顶板上。西周墓随葬陶器的组合以陶鬲、罐为主，不见本地殷商墓常见的陶觚、爵及其组合。

陶器器类主要有鬲、簋、豆、罐、甗。鬲为夹砂灰陶，余为泥质灰陶，多浅灰，个别簋的陶色偏黄。纹饰有绳纹、弦纹和附加堆纹。铜器共 19 件，有戈、泡、镞、算等。

与长安沣西、周原等地典型西周遗址相比，刘家庄北地墓葬的陶器与前两者的西周早期陶器非常相似，可知这里的西周墓的时代都属于西周早期。此外，这里的周墓随葬青铜戈达13件，说明一些墓主的身份或许就是兵士，这对于探索殷墟遗址晚商与西周文化的变迁、西周时期人群的身份和族属等有一定意义。

（4）孝民屯

孝民屯西周墓9座，集中分布于发掘区的东南部。均为小型墓，其中5座墓底有腰坑，2座的腰坑内还保存有狗骨。随葬品都很简单，以陶器为主，器类主要有鬲、簋、罐，个别墓葬随葬有铜戈，还有一些墓葬内有贝。时代为西周早期。

（5）侯家庄南地

所见有墓葬1座（M13）。从出土陶鬲、簋形态看，接近西周晚期。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殷墟范围的西周遗存时代包括西周早、晚两个时期。总体来看，与殷墟几乎随处可见丰富的殷商地下堆积的情况相比，殷墟范围的西周遗址地点很少，仅见于很有限的几个地点，遗迹类别几乎限于墓葬一种，数量也非常少。西周早期遗存相对较多，其中刘家庄北地与西北冈两处地点的遗存相对丰富，尤其墓葬更多，前者在殷商宫殿区之南不远，后者在殷商王陵区，两个地点的空间分布颇令人关注；西周晚期者有小屯北地、侯家庄南地两处，遗存非常零星。

2. 殷墟周边

（1）西高平

位于安阳市西17千米的安阳市彰武镇西高平村西北部，洹河从遗址西部自南向北流过，在遗址西北部折向东流。遗迹有灰坑、墓葬。

墓葬2座，为竖穴土坑墓。1座为仰身直肢，头骨上侧随葬陶豆1件，陶鬲1件，口含贝。1座为仰身直肢，头向东，面向北，双臂交叉放于腹部，骨架保存较好。头部上侧随葬陶鬲1件。

西周文化遗物发现较多，以陶器为主，主要器形有鬲、甗、簋、豆、盆、孟、瓮、陶拍、纺轮等。还有较多的骨器和少量的石、蚌、玉器等。

据西高平考古报告，这里的西周遗存是很丰富的。陶器种类多样，各类陶器尤其是鬲、豆、盆、罐各自的形态演变有序。这里的西周文化遗存时代延续较长，有进一步分期的必要。根据陶器的形制、比照其他时代明确的西周遗址资料，可将西高平西周遗存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第一期：西周早期。以M1、H41、H42为代表。本期商式鬲的口沿斜立，低裆，袋腹到足跟部近直；商式簋的腹较深，腹向下缓斜收。商式盆的腹较深，沿近平，短颈。瓮肩较高。

第二期：西周中期。以 H18 为代表。本期商式鬲的口沿斜立，低裆，袋腹外鼓；商式簋的腹较深，腹向下急斜收。豆盘很浅，盘壁直，折腹。商式盆的腹较深，沿近平，领变长。瓮肩比早期低，腹最大径偏下。

第三期：西周晚期。以 H89 为代表。本期商式鬲的口沿普遍较平。豆盘比中期深，柄部有凸棱。商式盆为斜腹。瓮束颈，较明显。

（2）黄张

黄张遗址位于安阳市南、洪水河北岸。西周遗迹有灰坑一种，清理 30 座。开口多为近圆形，斜壁或直壁，平底或锅底形。填土多较杂，土中夹杂细碎红烧土粒、炭屑，一般可分层。

黄张西周遗存出土物也主要为陶器，可辨器形有鬲、盆、豆、罐等。其中鬲最多，其他器类较少。如对 H26 统计，在所有 120 件（以口沿计）标本中，其中鬲 96 件，盆 14 件，豆 5 件，罐 4 件，孟 1 件。

黄张遗址西周遗存的时代集中，相当于西周晚期。

（3）大寒南岗

大寒遗址位于安阳市东南 15 千米，洹河下游。遗迹有灰坑 4 个。出土有鬲、盆、豆、罐等陶器。陶器种类虽然不是很多，但与同类居址比较，大寒南岗的西周遗存与西高平、黄张等有很多相似之处。墓葬 3 座（M1、M5、M7），随葬陶器组合为鬲、豆、罐。

大寒南岗的西周遗存的时代为西周晚期。

总体来看，结合多次调查和发掘可知，与殷墟范围少见西周遗址、且遗存几乎限于墓葬的情形相比，殷墟周边的西周遗址地点明显较多，遗存也比较丰富，更有像西高平这样时代延续整个西周时期的遗址地点。可见，殷墟及其周边一带的西周文化在空间分布上有一定区别。

以上各地点西周遗址的时代对应关系如表一：

表一 殷墟及周边主要西周遗址的空间分布与时代表

遗址地点	空间位置	西周早期	西周中期	西周晚期
刘家庄北地	殷墟内	√		
小屯北地	殷墟内	√		√
西北冈	殷墟内	√		
孝民屯	殷墟内	√		
侯家庄南地	殷墟内			√

西高平	殷墟外	√	√	√
黄张	殷墟外			√
大寒南冈	殷墟外			√

三. 殷墟及周边的晚商文化与西周文化的传承与革新

1. 殷墟及周边的晚商文化与西周文化的传承与革新

从上文对主要遗存的分析看出，殷墟及周边一带的本地西周文化与殷墟晚商文化、以关中地区为代表的典型西周文化都有一定可比性，同时与后两者有一定差异。

本地西周文化的陶器主要有鬲、甗、盆、簋、豆、孟、罐、瓮等。这些陶器类别看上去似乎与殷墟晚商文化、其他地区的西周文化并无明显不同。但如果对其作详细分析，如具体到陶器形态以及墓葬葬俗等方面，明显可见，本地西周文化明显具有商式、关中典型周式和豫北冀南周式三类风格：

第一类：商式风格，特征很突出。

遗迹方面，最明显的是墓葬底部有腰坑，这种情形见于刘家庄北地、孝民屯等地。这与晚商文化墓葬葬俗一致。

陶器有 A 型和 B 型分裆鬲、A 型簋、A 型盆与甗、A 型罐、瓮等系列陶器，这些都是殷墟晚商文化最常见的陶器；其中作为陶器群核心的炊器为鬲、甗，这与晚商完全相同，而与以关中地区为代表的典型西周文化陶器以联裆鬲、联裆甗为核心的陶器群明显不同。

第二类：以陕西关中西周文化为代表的典型周式风格。

这种风格基本表现在陶器上，有 C 型鬲、B 型簋、A 型豆、B 型盆、B、C、D 型罐等，这些陶器几乎与陕西关中等地典型西周文化的陶器非常相似。

第三类：豫北冀南周式风格。

这种风格基本表现在陶器上。这类陶器以 D 型鬲和 B 型豆为代表，它们在商文化、关中典型西周文化中几乎不见，风格非常独特。其中 D 型鬲，刘家庄北地简报已指出，多见于邢台南小汪和葛庄等地^[25]太行山东部的西周墓葬；此外，这种风格也见于河南洛阳^[26]以及其他地方，但明显少于豫北冀南的一些重要地点，可知它是这个地区的一个特点。

总体来看，本地西周文化中，虽然商式和周式风格的陶器在居址、墓葬中都存在，但以商式风格更为醒目，器物种类多，数量也多；周式陶器则大多见于墓葬。其中作为典型周文化的标志性炊器如联裆鬲和联裆甗，在本地非常少见；与之正好相反，原来的商文化的标志性炊器商式分裆鬲等则非常普遍。以西高平、黄张等发掘面积较大的遗址为例，本地西周居址中，商式风格的陶器尤其是炊器的比例明显要高于周式风格者，如西高平西周居址中，鬲有 499 件，其中典型商式鬲 488 件；盆与甗基本为商式，瓮也为商式，簋较少，商、周式比

例接近。类似的情况也见于黄张遗址。历次调查所见，各个遗址的陶鬲也大多是商式的。在墓葬方面，本地相当一批西周墓葬的随葬陶器多为商式风格，最典型的为商式分档鬲、绳纹簋等，这种情形尤以殷墟周边的西周遗址中最为普遍。

本地西周文化的这种特点是如何形成的，它到底有着怎样的背景，具体来说，本地西周文化与殷墟商文化、典型的西周文化间有着怎样的传承关系，下面将其与殷墟商文化、典型西周文化作具体比较分析。

我们知道，本地晚商文化与本地西周文化在时间维度上是一种前后相继的关系，在空间维度上是一种共享关系。从各类陶器的形态看，商式陶器与之前的殷墟晚商文化陶器相似，与后者明显处在同一演变轨迹上，应该是晚商文化陶器的延续。两者的这种关系明确可知，本地西周文化中的商式风格明确无疑是从殷墟晚商文化传承而来，也就是说，殷墟晚商文化与本地西周文化间具有明确的传承关系。

但是，本地西周文化与殷墟晚商文化间有一些差异：

（1）本地西周墓葬所见小型土坑竖穴墓，与商文化的同类墓葬比较，开口相对窄、长。在葬俗方面，与商文化墓葬常有腰坑的情形不同，本地西周墓葬仅少数有腰坑，多数则没有腰坑。如刘家庄北地的 26 座西周墓中，有腰坑的仅 7 座；相反，同一地的晚商墓则均有腰坑。

（2）在墓葬随葬品方面，本地西周文化的随葬陶器有鬲、豆、簋、罐等，或仅随葬鬲一种，或以鬲、簋、罐或鬲、豆、罐为组合，这与殷墟晚商墓葬以觚、爵为核心的组合明显不同。

（3）本地西周文化中有一些陶器与晚商文化的器类形态明显不同，如联裆鬲、带“S”形纹的簋、矮柄豆、素面罐等，这些与晚商文化相异的风格恰恰是与典型西周文化相同的地方。这种差异在墓葬随葬品方面表现最为明显，如本地西周墓葬的随葬品中，联裆鬲、带“S”形纹的簋、矮柄豆、素面罐等，一望而知，它们是典型西周墓葬最常见的随葬陶器。此外，正如上文所说，殷墟范围发现的西周墓葬中，盘口柱足鬲多见于洛阳和太行山东部很多西周遗址，这在殷墟文化遗存中几乎不见。

可见，本地西周文化与殷墟晚商文化相区别的因素，恰恰是本地西周文化与关中等地周文化相同的因素。相对于商式因素，本地典型的西周文化因素无疑是外来因素。从这种关系不难看出，正是由于典型西周文化因素的加入，从而造成了本地西周文化与之前的殷商文化在文化面貌上出现一定区别的情况，这种差异或可理解为对商文化的革新。

2. 殷墟与周边地区西周文化的差异

如果我们再注意到本地西周文化在空间上的特点，还有一点值得关注，虽然本地的西周文化无疑属于西周文化的一部分，但仔细比较，殷墟与周边地区的西周文化在空间上也存在一定差异，即呈现出“内”“外”有别的态势。这种情形反映在遗址数量和遗址面积、延续时间、文化风格等方面。

首先从遗址数量和面积看，在殷墟范围内，西周文化的遗址地点明显很少，已知有西北冈、刘家庄北地、孝民屯、小屯北地、侯家庄南地等很有限的几处。以往对殷墟这个面积达30余平方千米的遗址作了很多考古工作，在同样的考古工作频率下，与几乎随处可见殷商遗存的情形不同，这里的西周遗址几乎没有像样的居址，所见大多为墓葬，除刘家庄北地和孝民屯两处较小墓地外，其他几个地点所见遗迹现象相当少，遗迹数量也很少。可见，与殷商都城的兴盛气象相比，殷墟范围内有限的几处西周小遗址明显显得凋零，两者的反差之大，瞬间立判。与此相反，在殷墟周边的洹河流域，西周遗址相对较多，历次调查所见，晚商、西周遗址的数量差别并不大。可见，相对于殷墟范围内的晚商与西周遗址在数量和面积上存在的巨大反差，外围的西周遗址数量是相对稳定的。再通过西高平、大寒南冈、黄张等遗址的考古工作可知，比起殷墟范围内西周遗址相当零落的情形，外围的西周遗址面积也明显比较大，遗迹也比较丰富。

从年代看，在殷墟周边，西周文化从西周早期一直延续到晚期，典型如西高平遗址。在殷墟范围内反倒只有西周早、晚两个时期的遗存，西周中期遗存目前还未见。其中西周早期遗存明显略多，西周晚期的则非常少，而且仅限于小屯北地、侯家庄南地两处。

从文化风格看，在殷墟周边地区，西周文化从西周早期到晚期始终表现为浓厚商式风格。这里的文化保留了原来殷商文化长期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埋葬习俗。这种风格与殷墟以外更远地区的西周文化都是一致的，如殷墟以南的浚县辛村西周墓葬^[27]、更南的温县陈家沟^[28]和殷墟以北的邯郸台台寺^[29]等。这种文化传统承自殷墟晚商文化，延续到春秋早期，才被传承自西周文化主流的晋文化彻底终结。相反，相对于外围这种浓厚的商式风格，殷墟范围内的西周文化则具有一定独特性，以周式风格最为明显，如周式鬲、豆、簋等，商式陶鬲也与殷墟外围的常见的同类鬲有一定差别。由于它仅局限于殷墟范围内，分布范围小，外围被浓厚商文化风格的西周文化包围，所以呈现为“文化孤岛”的态势。

总之，通过本地西周文化与殷墟晚商文化的比较考察，可知本地西周文化与殷墟商文化、关中等地的周文化间有同有异，其中不仅有对殷商文化的强烈传承，也有一定的革新，而且本地西周文化的商式与周式两种风格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一定差异。

周武王灭商尤其是周公东征后，殷墟所在的大邑商都成为废墟。从殷墟尤其是周边西周文化具有浓厚商式风格可知，不论是经过多么剧烈的冲突、如发生周人灭商这种王朝更替的重大事变，即使商、周两个族群的地位发生完全的倒置，作为被征服者的商人的文化，还会长期延续原有的文化传统，呈现出强烈的顽固性和保守性。所以，有学者将这种文化称为遗民文化^[30]。这种遗民文化虽然已非主流文化，但它仍然是一个族群原有文化的延续，是族群生活习俗、文化传统、族群心理的反映，是维系族群统一的纽带。可以肯定地说，殷墟及其周边这一狭小地域的西周文化中，商式与周式两种风格的长期存在，正是商、周两个不同族群在族群心理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反映。

在历史上，遗民文化并非周代独有，它在很多时期是存在的。包括这种遗民文化在内，古今中外很多文化往往会顽强保持自身独特文化传统。包括殷墟一带商、西周文化等古代很多文化显示，古代族群的独特传统，往往会在最普通的器具上顽强地反映出来^[31]。如在考古学文化中，即使最普通的陶质类文物，不同的考古学文化间，在陶器群、器物种类、形制等方面有着明显或比较明显的区别。由此可见，在当时，即使是很普通的陶器（尤其是作为炊器如鬲、甗），它不只是一种单纯的用具，还可能是使用陶器的人们共同体的标志之一，它

所反映的思想观念是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在精神领域的重要内容。

四. 殷商都城的废弃与殷遗民的分徙

如上文所说，在殷墟范围内，西周文化的遗址地点明显很少，也没有成规模的像样的遗址。可见在西周时期，殷墟一带相当凋敝；除西周早期外，这里似乎很少有人居住生活；西周早期文化又以周文化传统最为浓厚。与此相反，在殷墟外围，整个西周时期仍然像晚商时期一样，聚落数量仍然比较多，浓厚的商文化传统一直得以延续。如果比较殷墟内、外的西周文化特点，明显可见，殷商故都外围使用浓厚商式风格陶器的族群应该基本是商人，而在殷商故都范围内生活的人群应该基本是周人，而且人数相当有限。总之，到西周早期，曾经一个面积达 30 多平方千米、兴盛了 270 多年的殷商都邑已不复存在，这里人群的族属也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原来生活在殷商王都的众多商人类群似乎去向成谜，而少数后来者——王陵区和刘家庄北地等地墓葬的主人——周人来到殷商故都。

但是，如果结合传世文献记载，殷墟发生的这种巨变，无疑反映的是因周人灭商而发生王朝更替、周公东征后“迁殷顽民”^[32]等历史事实。也就是说，周人灭商后，生活在前朝首都、在生活风俗与传统文化等方面保留殷商特征的商人成了殷遗民；周公东征后，对殷遗民采取强制性地分徙措施，从而使兴盛 270 多年的殷商王都被空心化；西周早期以后，殷墟至少见有人活动，这里真正成为废墟。因此，殷商王都的废墟化和周人分迁殷遗民，是有意为之的行为和结果，这是周人进行国家治理、维护周王朝统治的重要举措。

关于殷遗民及其迁徙问题，20 世纪 30 年代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33]，20 世纪 50 年代初，洛阳市东郊发掘了一批西周时期的墓葬，随葬品明显有殷商风格，有学者认定它们的墓主身份是殷遗民^[34]。现在，很多文章和专著中涉及有关殷遗民的问题^[35]，其中有的甚至是专门研究殷遗民的专著。

有关殷移民的迁徙和流向是学界讨论的重点。据一些传世文献，可知殷遗民的主要流向有东都洛邑、卫国、鲁国等地：

1. 东都洛邑

《尚书·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尔殷遗多士，……’。”《尚书·序》：“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这是传世文献当中有关殷遗民的最确切的记录，这也是“殷遗”的最初内涵。

2. 卫

《左传·定公四年》：“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史记·周本纪》：“颇收殷余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

3. 鲁

《左传·定公四年》：“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

此外，一些研究者还认为殷遗民还有其他流向，限于资料，现在难以确考。

有关“殷遗民”的概念及其界定，是从前引《尚书·多士》及《尚书·序》的记载而来的。但现在有关讨论中，对殷移民的理解有较大差异。如有学者就迁于鲁国的殷遗民认为³⁶，分给鲁公的殷民六族中，徐氏在鲁东，条氏、萧氏在鲁南，索氏在鲁西，长勺氏、尾勺氏在鲁北，说明他们原本就居住在鲁国周围。现在，更有研究者将生活在西周王朝的所有商人都归入商遗民^[37]，这种界定显然更宽泛。

我们以为,《尚书》等文献所称的“殷顽”(殷遗民),应该主要是从殷墟这个殷商故都强迫迁出的以家族为单元的居民。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武王灭商后,控制原商王畿地区是周王朝国家治理的重大任务,其中对殷商旧都的商人进行监控是重中之重。《史记·周本纪》记载:“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38]。治殷的重要举措就是设立三监,正如《逸周书·作雒》说:“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郑玄《诗谱》也说:“周武王伐纣,以其京师封纣子武庚为殷后。庶殷顽民,被纣化日久,未可以建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监,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39]。由于武王灭商后第二年就死去,周公摄政,“三监及淮夷叛”^[40],周公“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41]。在周公东征克殷后,即有迁殷遗民之举,所以《尚书·召诰》记载在建设成周时,有殷庶攻位的记录。随后分封诸侯如鲁、卫等,又分迁多支殷遗民。因此,周人所迁的殷遗民,应该首先是殷商故都等地强烈反抗周王朝的地区所迁的人群。

第二,殷遗民,《尚书》又称“殷顽”。以“殷顽”称之,显然可见他们强烈地保有殷商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和族群心理,这是学界公认的。在晚商阶段,从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看,在所有商文化类型中,以殷墟遗址为核心的殷墟类型的遗存最丰富,商文化特征最典型,文化水平最高^[42];殷墟类型外围以至于更远的地区,距离殷墟及王畿越远,商文化风格越淡薄;殷墟类型无疑是晚商文化的主流文化形态。殷墟都城遗址在整个晚商文化遗址中等级最高,规模最大,这与殷墟作为晚商王都的地位是完全相称的。从考古学文化可见,这种主流文化形态,以殷墟都城以及殷商王畿地区最为浓厚,直到西周时期,殷墟外围的西周文化仍然强烈地保持着浓厚的殷商文化传统,其人群无疑就是在文化、生活习俗和心理上认同商文化的群体。在古代,一种主流文化形态,会在一个国家的首都这样的中心地区的人群中得到最强烈的传承,这种情况在古代应该是最正常不过的,即便在今天,人群和文化交流频繁的传统社会,仍然会有一定反映。

第三,正如上文分析,在西周早期,殷商故都发生了废弃这样一个巨变,这无疑是周公东征、强迫外迁殷遗民的结果。与此相反,相对于殷墟范围内的这个巨变,殷墟外围在整个西周时期,仍然像晚商时期一样,遗址数量仍然是稳定的,浓厚的商文化传统一直得以延续。由此推断,外围的居民点、人群及其社会结构并没有因为周人灭商而破坏,与殷商故都范围内的人群被迫迁出不同,外围则不存在被大规模迁走的情况。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文献记载的殷遗民,其主体甚至大多数人应该是原来生活在殷商故都的以家族为单元的族群。正由于殷商故都发生了大规模的人群迁出,以至于使这个大型都邑完全废弃。至于殷墟以外其他地区,或许也存在商人被迫迁走的情况,恐怕从规模上来说是很有限的。所以,本文也不认可将殷遗民主体界定为殷墟以外其他地区商人乃至原所有商王朝疆域内人群的观点。

附记:本文提要曾提交2012年8月底在河南安阳召开的“东亚古代青铜冶铸业国际论坛”。

[1]参见柴晓明.华北西周陶器初论.青果集.北京:知识出版社,1993.段宏振、张翠莲.试论太行山东麓地区的西周文化.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知识出版社,1996.刘绪.西周早期考古学文化与周初分封.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考古学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徐良高.周文化演进模式的考古学考察.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第二、三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豆海峰.太行山东麓地区西周文化分期研究.华夏考古,2013,(2);豆海峰.太行山东麓西周时期考古学遗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何毓灵.殷墟王陵早期被盗年代研究.考古,2014,(6).

[2]见于殷商王陵M1002、M1003、M1004、M1550等.有关具体情况张敏已作了比较详细的梳理,见:殷墟王陵上的晚期遗迹及早期盗掘坑年代辨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12).

-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安阳侯家庄北地一号墓发掘简报第 36 页. 考古学集刊, (2).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安阳殷墟小屯建筑遗存.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河南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殷墓与西周墓. 考古, 2005, (1).
- [6] 有 M27, 见: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 1995-1996 年安阳刘家庄殷代遗址发掘报告. 图一四: 1、10, 华夏考古 1997, (2).
- [7] 殷墟孝民屯考古队. 河南省安阳市孝民屯遗址西周墓. 考古, 2014, (5). 此外, 笔者整理孝民屯资料所见, 还有西周早期灰坑 1 个, 详见: 安阳孝民屯(待刊).
- [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安阳市西高平遗址商周遗存发掘报告. 华夏考古, 2006, (4).
-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张发掘队、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 河南安阳市黄张遗址两周时期文化遗存发掘简报. 考古, 2009, (4).
- [10] 何毓灵. 殷墟王陵早期被盗年代研究第 94 页、图一: 20, 考古, 2014, (6).
- [11] 胡厚宣. 殷墟发掘: 第 111-113 页, 上海: 学习生活出版社, 1955.
-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河南安阳洹河流域的考古调查. 考古学集刊, (3).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河南安阳洹河流域的考古调查. 考古学集刊, (3).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 [1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 安阳洹河流域几个遗址的试掘. 考古, 1965, (7).
-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安阳大寒村南岗遗址. 考古学报, 1990, (1).
- [16] 安阳市博物馆. 豫北洹水两岸古代遗址调查简报. 中原文物 1986, (3).
- [17] 中美洹河流域考古队. 洹河流域区域考古研究初步报告. 考古, 1998, (10).
- [18] 据中美洹河流域考古队. 洹河流域区域考古研究初步报告图六改制, 考古, 1998, (10).
- [19] 张敏. 殷墟王陵上的晚期遗迹及早期盗掘坑年代辨析.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1, (12).
- [20] 井中伟. 殷墟王陵区早期盗掘坑的发生年代与背景. 考古 2010, (2). 张敏. 殷墟王陵上的晚期遗迹及早期盗掘坑年代辨析.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1, (12). 何毓灵. 殷墟王陵早期被盗年代研究. 考古, 2014, (6).
- [21] 井中伟. 殷墟王陵区早期盗掘坑的发生年代与背景. 考古, 2010, (2): 87.
- [22] 参见张敏. 殷墟王陵上的晚期遗迹及早期盗掘坑年代辨析,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1, (12): 130-131.
- [23] 张敏. 殷墟王陵上的晚期遗迹及早期盗掘坑年代辨析图四,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1, (12).
- [24] 见李济. 殷墟器物甲编·陶器附“殷墟陶器图录”: 鬲为 16G(C64), 豆为 208D(C172) 和 208E(YH396), 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三本), 台北: 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 1956. 又见李济文集(卷三)之殷墟器物甲编·陶器附“殷墟陶器图录”.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25] 任亚珊、郭瑞海、贾金标等. 1993-1997 年邢台葛家庄先商遗址、两周贵族墓地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 三代文明研究(一).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9. 贾金标、任亚珊、郭瑞海. 邢台地区西周陶器的初步研究. 三代文明研究(一).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9.
- [26] 刘富良. 洛阳西周陶器墓研究. 考古与文物, 1998, (3).
- [2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浚县辛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64.
- [2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温县陈家沟遗址发现的西周墓. 华夏考古, 2007, (2).
- [29] 北京大学、河北省文化局邯郸考古发掘队. 1957 年邯郸发掘简报. 考古, 1959, (10).
- [30] 杨宝成. 试论遗民文化.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4, (6).
- [3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学·两周卷第 182 页,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32] 尚书·序. 孙星衍. 尚书今古文注疏.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602.
- [33] 傅斯年. 周东封与殷遗民.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4 本第 3 分册, 1934: 285-290. 又见傅斯年全集第三卷(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先秦卷(北京: 中华书局, 2009)等.
- [34] 郭宝钧、林寿晋. 一九五二年秋季洛阳东郊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 (9).
- [35] 白川静. 周初殷人之活动. 刘俊文主编.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三卷)上古秦汉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122-149. 张政烺. 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 历史教学, 1951, (10). 陈梦家. 西周金文中的殷人身份. 历史研究, 1954, (6). 杜正胜. 周代封建的建立.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50 本第 3 分册, 1979. 杜正胜. 略论殷遗民的遭遇与地位.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53 本第 4 分册, 1982. 任伟. 从考古发现看西周燕国殷遗民之社会状况. 中原文物, 2001, (2). 朱凤瀚. 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 259-286 页. 吕观盛. 周初殷遗民管理政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06). 宫长为、徐义华. 商代史·殷遗与殷鉴.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 [36] 王恩田. 山东商代考古与商史诸问题. 中原文物, 2000, (4).
- [37] 吕观盛. 周初殷遗民管理政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06).
- [38] 史记·周本纪.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 [39] 孔颖达. 毛诗正义卷二引.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 [40] 尚书·序. 孙星衍. 尚书今古文注疏. 北京: 中华书局, 597.
- [41] 尚书大传洛诰篇. 王闳运. 尚书大传补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 [4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六章第二节,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304-325.